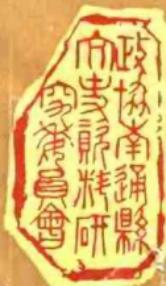


10.07

南直縣之史資料

第二輯



南通县文史资料

第二辑

1988.11.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南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1988年3月

封面题字 吴沫初

篆 刻 宋向渔

南通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内 部 发 行

每册成本费1.50元

印 数 1—4000

目 录

· 海峡两岸 ·

- 会亲记 得 操 (1)

骨肉团聚

——台胞盛斯族回乡探亲记 刘 俊 瞿锡高 (5)

· 革命风云 ·

- 南通县建立最早的工农武装 (9)

东乡妇女求解放 姜炳南 俞素梅口述 庄 兑整理 (11)

团结斗争度春荒 (14)

日寇凶残 人民血泪

——忆日本侵略军在石港的暴行 朱启寅 (17)

反“清乡”斗争中的余西区委 曹永安 (23)

关于《东南晨报》的回忆 罗博生 (27)

抗战期间我在地下交通线上

..... 黄维经口述 曹汉宸整理 (30)

难忘的岁月

——忆金沙小学坚持抗日教育侨迁严灶

..... 陆牟机 (35)

抗日战争中的石港郑锦记印刷所 戴国荣 (41)

“三条桥” 陈兆岐 (43)

“鸡贩子” 王锦章 (45)

两个八月十五 黄企舟 (47)

三余惨案 黄企舟 季永泉 邢安明 (50)

蒋达脱险记	茅慎之(56)
朱凤祥夺枪	陈兆岐(60)
· 工商经济 ·	
南通县油坊业发展简史	叶文华(62)
大有晋盐垦公司历史概貌	熊耀琪(75)
五总茅靴	戴礼(78)
· 文教卫生 ·	
五十年代南通县农民教育史略	钱明樵(82)
天竺山小学添设民办高级班的经过	朱章民(104)
三泰和捐资建校	费春耕(107)
艰苦奋斗 勤俭办校	
· 忆创办兴仁区中心农民学校	钱明樵(110)
漫谈平潮花灯盛事	汤镜明 钱思平 沈镜湖(115)
组建南通县医联会的前前后后	陈伯书(120)
石港新闻事业史料	雨 苍(123)
· 人物春秋 ·	
自有芳菲在人间	
· 忆费枫同志	丁究周(125)
忆陈寂笑烈士	王彬(131)
为党的利益视死如归的倪育李烈士	倪育才(134)
余忠信烈士传略	茅慎之整理(136)
于支平同志牺牲四十年祭	陈震林(138)
革命老妈妈俞治平	王士明(143)
刘光谦的外交生涯	顾汶潜(146)
同盟会员施述之先生事略	王士明 陆舟山(154)
张謇“三考”	朱漱梅(159)

先祖父钱浩哉事略	钱京岚(165)
孙敬办学	季子(167)
余西名医风先生	曹玉麟(171)
翟厚丸大力士	顾维勤(173)
俞福基其人	严际中(176)
·名胜古迹·	
从我国寺庙起源谈到石港七十二个半庙	沙念慈(180)
话说兴仁城隍庙	朱平(188)
平潮“亦陶园”话旧	沈镜湖(192)
·陈迹拾景·	
南通光复后至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	
县级行政机关和职官变更情况	严际中(194)
反共顽固派俞福基和许少顿的“两面斗争”	蔡麟卿(199)
·读者·作者·编者·	
说明、更正	(210)
南通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增补人员名单	(211)
各片文史资料撰稿员文史书刊发行员名单	(211)
编后记	(214)
照片	封二、封三

会亲记

得操

我是一名教师，现在通海区教育辅导组工作。我父亲解放前在小海、上海等地当教师，于1948年底离家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父亲离家去台湾时，我出生才6个月，以后即使与父亲相见也不认识。然而在“左”的思想泛滥的年代里，我也未能摆脱受株连的厄运。1982年春节过后家中收到父亲的第一封信，方才知道他在台湾，其间整整35年，当时我也正好是35岁。

亲莫过于骨肉，痛莫过于分离。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同胞与大陆亲友不能直接通信，有家难回。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大陆的大好形势，台湾同胞的思乡念家之意，逐渐凝聚成一股时代潮流，即：人心所向，实行三通，祖国统一。

我父亲给家中（系给我母亲的）第一封信中写道：“阔别多年，思念良深，余自离家，全家生活由你独立撑持，诚愧对万分。家中生活情形如何？你身体情形如何？三个子女的生活情形如何？余时在念中，切盼来信告知，以慰渴念。”寥寥数语，足见其思乡念家情意之殷切。

自此之后，每年约有数封来信，时常询问家中老幼生活状况，并多次嘱我去祖父墓地祭扫，以代他尽些孝心等等。我也每当接到他的来信，随即回信，尽量告知他想了解的家乡变化的新貌，家中安定幸福的生活等等。我常常告诫自

已：我的每一封回信都要给他带去安慰和欢乐。例如第一次给他回信我是这样写的：“父亲大人（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用这称呼）：来信收悉，又惊又喜，百感交集。母亲老泪流尽，总算知道你还在人间。我们做子女的，自有记忆以来，朝朝暮暮无时不想父亲。现见到父亲的亲笔，万分高兴。然而我们只能从字里行间来想象父亲的音容笑貌，盼望早日与父亲见面团聚。”另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家乡面貌早已改观，柏油马路，贯通东西，两旁建有银行、百货商店等大楼，另有能容纳一千余人的小海电影院是王个移题的字。”我还告诉他：“家中生活安定，吃穿有余，母亲一生艰辛，把我们兄妹三人抚养成人，对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我们定能赡养好，望父放心。唯独老父在外，我们做子女的不能侍奉，万望自己多加保重，并翘首盼望团聚之日早临。”

总之，我要认真写好每一封回信，把这一张张小小信笺变成一个个小小的窗口，使台湾人民通过这些窗口看见祖国大陆建设的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使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大陆，决不是台湾当局所宣传的那样。

1985年3月，我父亲又来信问我是否可能在暑假期间去香港会面。我把这件事与母亲商量好后回了信。在领导和亲友们的关心、支持下，我于7月中旬如期地去香港与阔别38年之久的父亲见了面。

清记得在香港与父亲第一次见面时，我们各自拿着对方的照片作辨认的依据。稍看一眼后，我父亲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见到了，见到了，终于见到了！”说完，我们父子俩便抱头痛哭起来。他又说：“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见面是这样

的难啊！”他把我从头到脚抚摸了一遍，擦了擦泪眼，说：“想不到长得这样结实，我放心得下了。”

这次去香港，我是以集体旅游形式去的。共安排10天，前3天是集体游览，后6天是探亲访友。会亲期间我原想说的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泪珠与语言俱出，想到那里说那里。我看到父亲原先拟好的一长串想要问的问题，交谈时却变得杂乱无章了。

交谈时他问我乘什么交通工具去港的，问家乡近况，问家庭生活情形，问家中老幼身体情形，问我工作情况，等等。我一向父亲作了回答，他听了感到很欣慰。交谈时，父亲时而流露出伤感之情。他曾说：“每天傍晚，我总要遥望西天（因为故园在他的西面），想到这是故乡所在的地方，这时我的心情特别惆怅。我常常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散步。有时回到家里打开钢琴弹起了30年代的一些曲子，因为这样我就象回到家乡一样。”

到香港见面前，父亲就对我说：“这次无论如何要给你从头到脚买起。”他还说：“从你呱呱坠地之后，我没有尽到抚养的责任，我愧对内子（指我母亲）。”我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使我们家人分隔两地，我们不怪父亲。现在我工作有保障，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家里吃的穿的样样有，这次出来我都带全了，父亲不必再花钱买了。”我父亲硬说：“不管你已带否，这是我的一片心意。你一定要领受。”我再三解释：“衣服等家里还有好多未穿，再买是浪费。再则，款式我也不喜欢，而且还会给旅途增加负担。由于我一再执意不肯领受，我父亲就只给我买了一双皮鞋（花了330多元港币），我才收下了。原因是这样的：我当时穿的

是一双新的风凉牛皮鞋，这种样子，在香港男的一般是不穿的，而妇女穿的较多。我父亲对我说：“你总要给我留点面子吧！到了亲戚家里，要被人家讥笑：为什么见到了父亲连一双鞋也买不起？”我为了照顾父亲的面子，收下了这双皮鞋。收下后我又对父亲说：“你给我买的这双鞋多不合算，要是在家乡，买这一双鞋的钱可以买十双呀！”

在会亲的第4天，对回程问题就要有所考虑了。父亲对我说：“你是否要彩电、录音机之类，我给你买？”我说：“家里都有。”并说：“母亲喜欢看越剧之类的，我早已购置了电视机，所以你什么都不用买。你如有钱积余，就自己用于营养营养身体。我们子女不能在你身边服侍你，你自己要多加保重。人到晚年，抵抗力渐弱，特别要注意饮食起居和营养保护。”我父亲听后，眼眶马上湿润了。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有些外国人对中国大陆了解甚少，因而有偏见。他们认为大陆和“穷”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一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里，碰到亲友，见钱眼开，就有损国格和人格，也失去会亲的意义。

最使我难忘的是7月28日，当我们旅游团即将启程回来的这一天早上，我父亲又紧紧拉住我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儿啊！我已年逾古稀，今天一别是分别还是永别很难说，家中老幼万望多多保重！”我说：“父亲，你也要格外保重，你的健康是我们全家人的安慰，盼望有朝一日能合家团聚！”父亲最后说：“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就这样，我们父子相互目送着对方的身影消失在香港的街头。去香港会亲的日子虽是过去了，但我深信，祖国统一、合家团聚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骨肉团聚

——台胞盛斯族回乡探亲记

刘俊 龚锡高

1987年11月25日下午两点多钟，在上海虹桥机场出口处，有姐弟两人，都已50开外，正焦急地向里面盼望着。他们是南通市纺工局的盛宇云和南通县岸西粮站的盛宇仁，在等候从台湾归来的父亲。出口处的行人渐渐稀少了，只见里面有位工作人员推着行李车陪同一位老者向出口处走来。凭着儿时的记忆和近年来邮寄的照片，姐弟俩终于认出了这位老者正是他们盼了40多年的父亲盛斯族。两人急忙拥上前去，弟弟接过行李，姐姐搀着老人。老人无限激动地说：“我时时刻刻想念着你们哪！”姐弟俩悲喜交集地对父亲说：“我们也一直在盼您回来啊！”说着，说着，已经走到专程去接的轿车旁，在一双儿女的搀扶下，老人高高兴兴地登上汽车，向故乡南通急驰。

时已82岁高龄的台湾同胞盛斯族老先生，原籍我县骑岸镇。1935年离家外出，早先曾在国民党南通县四安区公所和刘桥区公所做事，后来又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国民党总统府任文职官员。于1946年5月回到南通同家人见了一面，以后再也没有同家人见过面。1949年秋，从广州去台湾。

盛斯族离开大陆时，留下了妻子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海峡隔不断思亲情”。去台后，盛先生身处异地，心在故

乡，经常在夜间梦见家乡情景和妻子儿女。然而，“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面对浩瀚的台湾海峡，特别是面对人为的藩篱，年复一年，盛先生由盼望到失望，清苦与忧愁伴着他的后半生。青丝退去，华发早生，老人几乎有些绝望了。在信息不通的情况下，为了生活有个照应，老人与一位同命运的妇女结成了伴侣。但是，老人忘不了根在大陆，忘不了大陆的发妻和一双可爱的儿女。他想尽办法，多方奔走，托人传递消息，终于在1980年与家乡取得了联系。从此老人又看到了希望，虽然后妻十分通情达理，对他照顾周到，体贴入微，但老人执意要回大陆看看。他开始设计回乡方案，不能直接回乡，转道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行。前几年，听说有人以参加旅游团的名义，转道回乡探亲，他也满怀希望地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参加旅游团。谁知苦苦等了几个月，别人都批准了，唯独他一人不见回音。跑去一问，有关部门表面上连连打招呼，又说了一通大陆如何不能去的“道理”，百般无奈，盛先生只好暂时作罢。

“年年无望年年望。”盛先生怀着有生之年一定要回大陆的强烈愿望，苦苦地等待着。由于共产党对台方针政策的影响和台湾内外形势的压力，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87年11月有限制地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得知这一消息，盛老先生寝食难安，思乡之情愈加强烈。他赶紧办好了探亲手续，从台湾乘飞机经香港，于1987年11月25日到达上海。

踏上故土，盛老先生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一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见盛先生年事已高，连忙请他先到台胞接待处休息。他准备接受例行检查，而工作人员却亲切地告诉他：“台胞携带的合理物品免于检查。”临走时盛老先生领错了

行李，回去换时机场工作人员又热情相助。要回阔别52年的骑岸老家了，若不是有儿女陪伴，巨大的变迁使老人到了家门也不敢认了。老宅已被高大漂亮的新屋所代替，邻居们也大都盖起了新房。旧时故乡的影子已不复存在，如今的一切使老先生事事感到新鲜，处处感到亲切。对别离40多年后的合家团聚，老先生兴奋不已，唯老妻的猝然去世使他深感遗憾。盛先生去台后，他的结发妻子沈祝琴一人吃辛受苦把儿女培养成人，晚年沈老太太得了肺气肿病，经常卧床休息。盛先生到家时，重病的沈老太太露出了欣慰的神色。老太太深情地叮嘱丈夫：“两地气候不同，你要注意保重身体。”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竟带着亲人团聚的喜悦，满意地离开了人世。生离死别，长久的分离，短暂的相聚，使老先生陷入深深的悲痛与惆怅之中。

送走了辛劳一生的结发妻子，盛老先生决定到县城金沙镇小住，趁机探亲访友，观赏市容。县有关部门热情地接待了老人，并组织参观了县丝绸厂，在北山饭店合影留念（见图）。在金沙期间，参观和探亲访友之余，老先生接连几天，让孙女陪同，在金沙镇走大街、穿小巷，逛商店、看货摊，这里也要走走，那里也要问问……。老人就象初进闹市的孩童，要把故乡的一切看个够，以补数十年思乡之苦。

12月24日，盛老先生又在儿女的陪伴下，参观了南通市容，游览了狼山古寺。30日，返回台湾的日子快要到了，盛老先生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深深眷恋着的故土，转道香港回了台湾。



台胞盛斯族老先生与儿、媳、孙女合影

瞿锡高摄

南通县建立最早的工农武装

1928年11月，中共南通特委召开了南通、如皋、泰兴、海门、启东、靖江6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党的“六大”的决议，对照检查了过去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布置了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任务。会议要求各县都要组织一支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骨干队伍。

特委在6县县委联席会议上分给南通县12支短枪。县委书记林志和带了6支盒子枪到东五区建立了通东第一个武装小组，以后又在三益、余中、余东、余西4个区组织了4个武装小组，分别由仇建忠、唐楚云、俞金秀、陈宗恒等领导，打起红军的旗号，收缴地主枪枝。仇建忠领导的武装小组建立后不久，就曾攻入八索镇巡警局，缴到手枪1支，盒子枪3支，步枪7支。这是东乡农民武装小组建立后打响的第一个漂亮仗。武装小组同时又是工作队，每到一处都要宣传党的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斗争纲领和政治主张，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在东五区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影响下，中五区和西三区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主动收缴地主枪支，用来武装自己。

1929年春，在中共南通县委的领导下，各地的革命斗争一直很活跃。年初，县委组织农民进行了旧历年关斗争，以后又开展了春荒斗争和秋收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红军游击队初露锋芒，先后在新河镇、二窎镇、余东镇等处打了一些胜仗。到年底，武装力量已发展到四五百人，从而有力地

推动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党、团、农协、妇协等组织都得到较快的发展。

1930年1月，江苏省委指示通海地区各县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2月6日，根据省委指示，中共南通县委在草棚镇附近的张家宅召开大会，把已经组织起来的红军游击队编组成“中国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先后由俞金秀、仇建忠任大队长，仇恒忠（化名周文海、王益之，后叛变）、李超时任政治委员，李超时（兼）、唐楚云、俞海清任政治处主任。下设三个中队，由俞秀云、何兰歧、汤佐臣分别担任一、二、三中队的中队长。这支工农武装，主要活动于南通县东部和海门县北部地区。

中国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建立后，有100多个红军战士，于2月18日凌晨1时许，攻打了东社的地主武装，缴到盒子枪1支，步枪4支，子弹若干，自行车4辆，大洋近200元。下旬，又在草棚镇一带摆脱了国民党县警队的“兜剿”，叫敌人扑了个空。不久，这支初建的工农武装，即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第一支队（后称二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通海地区的广大群众一道，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武装，展开了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

（县委党史资料征委会供稿）

东乡妇女求解放

姜炳南、俞素梅口述 庄英整理

1928年底、1929年初，南通东部的余东区三益乡（今属海门县王浩乡）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妇联主任姜改莲、妇联副主任张连娥、唐楚云的妹妹唐大莲子（以上3人都是共产党员），其他乡也成立了妇女联合小组。为了求得自身的翻身解放，许多妇女踊跃参加了妇女联合会（小组）的各项活动。

她们积极地投入土地革命，参与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地替共产党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游击队站岗放哨，监视敌人，传递情报；帮助部队做军鞋、缝衣服，在部队打仗时，送饭送水和帮助抬送伤员等。1929年10月，红军游击队攻打敌人据点汤家苴时，因四面是河，不易通过，三益乡妇女联合会发动了几百个妇女，每人捧去一两捆稻草，填塞到河里，上面铺上木板，让红军游击队冲过去。1930年5月，红十四军又一次攻打汤家苴时，妇女联合会组织了一百多个妇女到前方送饭送水，慰问部队。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很艰苦，可是许多妇女宁愿自己家里省吃俭用，千方百计煮了大米饭和咸菜豆腐汤送到前方，支持红军部队打敌人。这对部队士气是个很大的鼓舞。

为了减少妇女的肉体痛苦和让妇女、男人都能省时省力、清洁卫生，她们反对妇女裹小脚，劝说妇女剪角子（系梳缠在脑后的大发髻）；反对男人留长辫，劝说男人剪短